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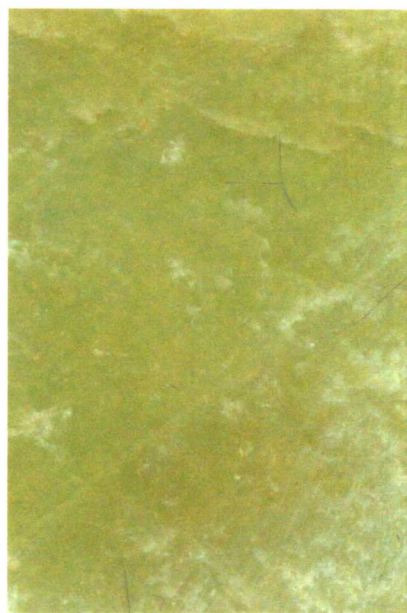
新石器时代北方卷

陆建芳 ○ 主编



方向明 周晓晶 ○ 著

# 中国 玉器 通史





# 中国玉器通史

陆建芳 ● 主编

---

新石器时代北方卷

---

方向明 周晓晶 ● 著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北方卷 / 陆建芳主编;  
方向明, 周晓晶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507-0967-6

I. ①中… II. ①陆… ②方… ③周… III. ①古玉器—文化  
史—中国—新石器时代 IV. ①K87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9484号

**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北方卷**

ZHONGGUO YUQI TONGSHI · XINSHIQI BEIFANG JUAN

总 策 划 尹昌龙  
出 品 人 陈新亮  
出版策划  
项目负责人 于志斌  
责任编辑 陈 嫣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封面设计 李松璋

---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 (批发) 83460397 (邮购)  
设计制作 南京书衣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83461000)  
印 刷 雅昌文化 (集团) 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495千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  
定 价 300.00元

---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中国玉器通史》编辑委员会

|                    |     |     |      |      |  |
|--------------------|-----|-----|------|------|--|
| 主 编                | 陆建芳 |     |      |      |  |
| 副 主 编              | 曾卫胜 | 孔富安 | 张宏明  | 刘云辉  |  |
|                    | 张 尉 | 李银德 | 方向明  | 周晓晶  |  |
|                    | 喻燕姣 | 吉琨璋 | 欧阳摩壹 |      |  |
| 编委会委员<br>(按姓氏笔画排列) | 于 明 | 于志斌 | 于宝东  | 孔富安  |  |
|                    | 方 刚 | 方向明 | 王志高  | 古 方  |  |
|                    | 左 骏 | 刘云辉 | 吉琨璋  | 吴 沫  |  |
|                    | 张 彤 | 张 尉 | 张宏明  | 李银德  |  |
|                    | 陆建芳 | 陈桂祥 | 周晓晶  | 欧阳摩壹 |  |
|                    | 喻燕姣 | 曾卫胜 | 韩建武  |      |  |

# 总序

2006年，陕西发掘出著作《考古图》及《考古图释文》的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之墓，被盗墓中还有墓主收藏的汉代玉璧等文物。此事说明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至迟应始于宋代。不过，由吕大临至清代吴大澂是以金石学的方法进行古玉研究的，他们缺乏层位依据，因而他们的古玉研究只能以文献为主要依据，所得结论常有谬误，亦无法以实物进行核证。

20世纪30年代，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前辈将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后<sup>[1]</sup>，国学基础深厚的李济、郭宝钧、夏鼐、郑德坤等先生均做过古玉研究。由于政治的原因，这种学术研究缺少沟通，因而并未形成大气候。而且，对出土文物的研究，相当一段时间是以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的顺序来反映其重要性。玉器类文物在考古发掘报告中只能列入“其他”类别。我们阅读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发掘报告，难以找到一张古玉的彩照，古玉的线图多不具备。考古界普遍忽视玉器的研究。直到1986年，辽宁牛河梁遗址和余杭反山墓地业已出土了数以千计令世人震惊的精美玉器，以研究陶器为主流方向的考古界某些权威仍然不为所动，仍对研究玉器颇有微词，并视之为不务正业。

【1】程旭主编：《金锡璆琳——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文物》，三秦出版社，西安，2007年。

20世纪后20年，国家兴起的城乡建设热潮使抢救性发掘成为中国考古的最大任务，随之而来的则是各地各类古玉层出不穷。大量古玉的出土，直接导致了古玉研究三个方面的改变：

第一，迫使考古界正视玉器这类遗存在古代历史中的价值和地位。考古界素来擅长以陶器类遗存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问题，但并不擅长研究玉器这类意识形态的产品。换言之，考古界擅长物质文化的研究，却拙于精神文化的研究。古玉的大量出土改变了这一倾向。

第二，按照牟永抗先生所言：“以玉件在墓内方位分布为基础的……（玉器）组合复原研究，为古玉社会功能探索开辟了新的途径。”<sup>【1】</sup>一些流传于世的散件玉器，其功能性质得以澄清，文化归属也得以确认。原有的古玉研究基础发生了动摇，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古玉研究的水平得到了全面提高。1992年，杨伯达先生为主编，综合了历史研究和考古学研究诸方面人才，合力编著并出版了《中国玉器全集》。《中国玉器全集》第一次向社会提供了可靠的古玉研究资料 and 比较合理的古代玉器发展分期。在此之前，牟永抗、吴汝祚在1990年张家港召开的“东南地区古代文化研讨会”上依据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新出玉器，第一次提出了“玉器时代”的观点，认为史前“玉器时代”的存在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一大特点。

第三，一批第一线的考古学者因为“遭遇大量古玉出土”而对古玉产生兴趣，从而走上研究道路，成为当前古玉研究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史学、地质学、文化学、工艺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也加入了古玉研究队伍。社会上形成了古玉研究的热潮，风行古玉收藏。

2000年是中国古玉研究的重要分水岭。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直接参与并规划了古玉研究，此举从根本上改变了考古界轻视玉器研究的现象。费孝通认为，在世界诸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国人有爱玉尊玉的传统，而且这种传统自8000年前至今始终没有中断。爱玉尊玉的历史后面应该有

【1】牟永抗：《古玉考古学研究初论》，《东方博物》，杭州大学出版社，杭州，1997年，第11页。



中华民族独特而深厚的文化背景。因此，“弄清楚玉器本身发展变化的历史，透过玉文化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了时代要求的，而且很急迫。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sup>【1】</sup>。

在费孝通的倡议下，中国考古界以“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为主题，自2001年起连续在辽宁沈阳、浙江杭州、四川成都等地召开了学术会议，以古代玉器为切入点，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中国考古界开始真正地从偏重对物质文化的研究，逐渐转变到对社会历史和精神文化的研究中来。这种改变既顺应了历史的要求，也整体提升了中国考古学的水平。

以目前所见资料看，笔者初步认为，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六个阶段。

#### 第一阶段：美玉阶段（约8000年前至约5500年前）

相信在初始阶段，古人并未把玉石完全分开，玉只是石中之美者。美石为玉是长时间存在的一种观念。这个阶段的玉器有两个特点：一、凡异于一般石材的美石均被当成玉来对待。软玉、蛇纹石、蜡石、燧石、绿松石、煤精等在此阶段均大量可见，可称这个阶段的玉为杂玉。二、玉器均为小件，品种单纯，有管、珠、玦、璜、坠，晚段出现玉珩类特殊器形。但总的来说，这个阶段的玉器以人身装饰件为主。值得强调的是，史前太平洋西岸地区玉器雕琢的两种标志性技术——管钻和线切割，均已在此阶段出现。

#### 第二阶段：礼玉阶段（约5500年前至商末）

这个阶段的玉材已被神化，被做成卜筮、祭祀、陪葬的礼器。和美玉阶段不同的是，这个阶段的古人对于软玉，亦即闪石类玉材，已有了明晰的辨别能力。无论是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还是良渚文化和齐家文化，所见用材已大多是透闪石类的软玉。与之相对应，随着玉雕技艺的提高和抽象思

【1】见费孝通先生在闭幕式上的讲话，费孝通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燕山出版社，北京，2002年。

“平安无事”、“瓜瓞绵绵”、“多子多福”、“马上封侯”、“五福献寿”等，祈福、祝福的主题成为主流并流传到今天。

以上六个阶段依序发展，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特点，也都具备各自的重要性，但真正使中国玉文化历久不衰，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和标志的，还是德玉阶段，这均和士大夫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相关。

士的萌芽至迟在商代晚期已开始，《史记》的记载大概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史记》曰：“（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sup>【1】</sup>西周时期，士的阶层逐渐形成。至春秋时期，由于各国争霸，士这个阶层首次有了亮相的机会，于是诸子百家如雨后春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思想高峰形成。由此可见，士的阶层首先是以思想者的形象面世的。对春秋以降的历史，我们可以把隋唐时期作为分界线，把士的作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隋唐之前，士主要是作为幕僚发挥作用；隋唐以后，科举制度产生，文官阶层逐渐形成，士的作用通过文官阶层来发挥。综合士大夫阶层产生的历史，他们的作用似乎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 一、历代政府管理的人才库。
- 二、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造者。
- 三、上层统治者和下层百姓之间的沟通桥梁。
- 四、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士大夫阶层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精英阶层，也是引领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主流阶层。这个阶层形成之初就十分注重自身道德和修养的修炼，充分体现在古代典籍中关于“君子”精神的论述中。

在先秦古籍中，《论语》、《孟子》、《诗经》、《春秋左氏传》、《周易》，都有关于“君子”的大量论述。士大夫阶层的形象代言人孔子率先系统地论述了“君子”的人格和修养要求。孔子认为君子的核心是道德，道德体现在“仁”上。而所谓“仁”，第一是正确处理家庭血缘关系，孝敬长

【1】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第一册，中华书局，北京，1982年，第111页。



辈，抚育晚辈。第二是爱人，并推己及人。第三则是“克己复礼”，保持内心的分寸，“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在人际交往上，孔子认为，君子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和而不同”。

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在物质生活上，孔子认为，君子要“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在言行关系上，孔子认为，君子要“敏于事而慎于言”。

在修养途径上，孔子认为，君子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在精神风貌上，《论语》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总之，孔子认为“君子怀德”，有德是一个君子最重要的表现。<sup>[1]</sup>

《孟子》则认为做君子是人的天性，君子应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浩然正气”。君子精神从过去对君王的要求，逐渐成为对士大夫阶层整体人格和精神的要求。这种要求从萌芽到完善，再到形成体系，延续了数千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精神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在这个过程中，孔子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孔子不但详细论述了君子之德的种种内容，而且明确地把君子之德和玉德相提并论。

亦即：

仁：温润而泽

知：缜密以栗

义：廉而不刿

礼：垂之如坠

乐：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诶然

忠：瑕不掩瑜，瑜不掩瑕

信：孚尹旁达

天：气如长虹

地：精神见于山川

德：圭璋特达

道：天下莫不贵之

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由此，钟情于玉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本能爱好。尊玉爱玉不但不是玩物丧志的表现，反而是修身养性的操守。士大夫阶层历来是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风尚的

[1] 杨天石：《君子——儒学的理想人格》，《江苏文史研究》2008年第2期。

引领者。上到帝王贵胄，下到平民百姓，无不爱好玉石。可以说，玉文化的本质或核心就是士大夫文化，而士大夫文化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中华文明的特点密不可分。在中国，离开了士大夫文化就无从谈论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中华文明的特点，也无法真正弄清楚玉文化。玉文化不过是“君子之德，中庸之道”这一传统文化核心的物化反映而已。也许，弄清这一点才是费孝通先生当年倡议的真正初衷。

撰著《中国玉器通史》的想法始于2005年。这一年我筹备了中国玉器研究会第五次研讨会，即江阴会议。参会者有130多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提交了70多篇论文。江阴会议给我的印象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在人才队伍建设、文献考证梳理、考古资料发布与研究三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应该可以做一些系统性的工作了。但撰著一部有关中国玉器的通史，非同小可，做这项工作与编纂玉器图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由于这是填补学术空白的工作，不但难度大，失败的可能也大；即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完成了，也可能吃力不讨好。我又想：这项工作总要有有人做，也许今后会有人建设中国玉器史的高楼大厦，而在目前若能搭建一间茅草屋也是有意义的。联想到费孝通以九二高龄仍然不辞辛劳地为玉文化的研究奔走呐喊，更觉得自己为之做些工作是责无旁贷的。2007年秋，我和曾卫胜、张宏明、孔富安四人在南京共同商议了撰著《中国玉器通史》的具体想法步骤。同年冬天，编委会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者有方向明、孔富安、王昱东、喻燕姣、吉琨璋、李银德、王志高、左骏、刘云辉、张宏明、张尉、周晓晶、曾卫胜。会议做了各卷的分工并提出花一年到三年时间完成，各卷争取做到三个“一网打尽”：考古资料一网打尽；相关文献一网打尽；研究动态资料一网打尽。在此基础上再展开写作。

事情的发展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先是有个别作者因工作繁忙退出，方刚和欧阳摩壹两位同志遂参加本套书的撰著。后来则是孔富安同志突发脑溢血不能再从事《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北方卷》的写作。关键时

刻，方向明和周晓晶两位不计辛劳，无怨无悔地接过他的工作，并妥善地将其完成。《中国玉器通史·宋辽金元卷》的写作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张宏明同志患脑梗，他是在恢复期中坚持把其文稿完成的。

从2007年到2014年，七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玉器通史》即将问世，作为主编，我应该将本书的不足之处坦率地告诉大家：就一部通史来说，七年的时间其实是很仓促的。而且，由于各卷作者工作的繁忙程度不同，对待写作的态度不同，各卷的质量是有一些差别的。另外，由于编委会希望各卷尽量反映各个时代的特点和状况，在体例上并没有做太多的硬性规定，因此读者在阅读本套书时难免会觉得同中有异。尤其要说明的是，春秋时代的相关内容在《中国玉器通史·周代卷》有反映，但非常单薄，这个不足只能在本套书修订时再弥补了。

回眸七年，时光荏苒，在此，我要感谢作者团队的友爱和团结。这些年，我们为写作这套书不断讨论和商榷，从编写体例到材料取舍，观点的交流和争论使我们亲如家人，每逢有困难，总有人主动站出来承担，无怨无悔。

我也感谢昆山台商会的陈桂祥先生，他是我多年的好友。2007年此书启动时，他主动为我们提供了第一笔资金，使项目得以顺利开展。我更要感谢杨伯达、卢兆荫、云希正、李学勤、牟永抗、杨震华等先生对我们的热情支持和悉心指导。在你们的指导下，我们才走上了研玉之路。

最后，衷心感谢海天出版社的领导和各位编辑，感谢你们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你们为这套书付出了非凡的努力和心血，感谢你们的辛勤劳动。

玉文化是物化的士大夫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当今之世，传统文化正在回归，蕴含“君子之德，中庸之道”的玉文化一定会在今后得到弘扬和光大。

陆建芳

2014年7月

古人所讲的“玉”，是指“石之美者”，即所有质地坚韧细腻、色泽光润美丽的矿物质都属于“玉”的范畴，包括和田玉（软玉）、翡翠（硬玉）、岫岩玉（蛇纹石）、绿松石、孔雀石、青金石、玛瑙、水晶等。而“玉器”则是指将玉材用琢磨的方法制作的各种器物；我们认为以打制和压制方法加工而成的玉制品，还不是真正的“玉器”。

## 一、玉石分化与玉器起源

赵朝洪先生认为，玉器起源需要具备以下几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古代先民在长期劳动实践中对玉石的性能及特征（硬度、韧性、颜色等）有了较好的了解，并且在劳动技术（主要是治石技术，打制、磨制、钻孔等）上有了明显的提高；二是原始宗教观念与审美意识的产生；三是便于取得玉石材料<sup>[1]</sup>。

玉器的起源，和玉器与石器的分化是同步的。大体来说，玉石分化的起点始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到了新石器时代，产生了真正的玉器。最初玉器产生的动力在于古人对美观和实用的追求，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在长期制作打制石器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辨识各种石材的经验，进而能够有意识地选择颜色、硬

【1】赵朝洪：《中国玉器的起源及相关问题》，2008年6月北京“东亚考古学会”论文，又见刘国祥、于明主编：《名家论玉（二）——2009珠海“中国玉文化名家论坛”文集》，科学出版社，北京，2009年，第106~115页。



度、韧性俱佳的美石，虽然这些美石通过打制工艺制作而成，尚不能称作玉器，但这是玉器从石器中分化出来的重要步骤；那些旧石器时代遗址中以骨、牙类材质制作的装饰品采用了磨光、钻孔等工艺，也是玉器产生的重要条件。

从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中可以得知，当时用以制造石器的石材不下二三十种，其中的水晶、玛瑙（玉髓）、透闪石、蛇纹石等美石，即是后来所谓的“玉”。在距今2万年前的辽宁海城小孤山洞穴遗址，出土了2件用岫岩老玉（透闪石）打制的石片和玉质双刃尖状器，同出的还有一批带有钻孔的精美角制品及装饰品<sup>【1】</sup>，说明小孤山居民已经具有辨识玉材的能力和审美意识，也基本具备了钻孔、打磨等制作玉器的技术。

进入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制作和使用磨制石器。对于美石，除了磨制，还要施以钻孔、饰纹和抛光工艺，并有意识地选择其使用功能，制成佩戴在身体各部位的装饰品，于是玉器逐渐从普通的石器中分离出来，成为高档贵重之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海岱地区的北辛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早期等遗址中出土的玉器，形制和制作技术都已经相当成熟，此后，在中国各地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玉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出现了红山文化、良渚文化这样的玉器中心。

## 二、玉器的发展与玉器的礼器功能

如果说玉器的起源仅仅是因为古人对美的追求，那玉器的发展道路是不可能贯穿中华民族8000余年历史的，中国古代玉器的不断发展更主要是缘于新石器时代以后玉器作为礼器的功能。

礼是一个社会的活动准则，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礼器作为在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具，其使用具有严格的等级规定，用以表明使用者的地位、身份和权力。礼器因稀有、难得（远距离）、制作时所需要的高技术和高工时而珍贵，因珍贵而被少数社会上层独占，因此具有权威性。玉器、彩陶、青铜器都具有作

【1】张镇洪、傅仁义等：《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发掘简报》，《人类学报》1985年第4卷第1期，第70~79页。黄慰文、傅仁义主编：《小孤山：辽宁海城史前洞穴遗址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北京，2009年，第27页。



为礼器的基本素质，由于各地区或各时期文化背景的不同，选用礼器的材质也不同。辽东半岛地域内的岫岩富产玉料，由于玉材不是很难得到，所以这里的人们并不认为玉是十分珍贵的东西，而是当做优良的石材进行使用，制作成斧、凿等实用的工具，该地区是利用陶、滑石等材料（而不是用玉材）制作能表达其思想意识和宗教信仰的艺术品，这种文化传统无疑会影响人们对玉器的需求，削弱人们从事玉器生产的兴趣和精力。新疆地区虽然是和田玉的产地，但这里的玉器产生晚于东部地区，而且在这一地区出土的早期（距今4000年左右的史前时期和青铜时代）玉器主要是工具和装饰品，缺乏礼器<sup>[1]</sup>。甘肃、青海和宁夏地区在距今4000年以前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时期以发达的彩陶作为礼器，而至齐家文化时期出现了玉礼器，原来在该地区作为礼器的彩陶器骤然衰落<sup>[2]</sup>，可以看出在这一地区礼器角色由彩陶到玉器的转换。

总的来看，在新石器时代，东部沿海地区多以玉器为礼器，中原和西北地区则多以彩陶为礼器。玉料相对于普通的石料，其矿藏的分布地和储量都是稀少的，也是珍贵的；相对于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来说，琢磨一件玉器所需要的工具、工艺难度和工时都要强于石器，可以说是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代表，因此玉器成为新石器时代东方地区某些考古学文化中的重要礼器。

原始宗教信仰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为宗教目的而举行的巫术祭祀仪式是当时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宗教活动主要是在“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以巫术为主要形式，对神祇和祖先的崇拜与祭祀。原始宗教是催生古代礼制的温床，最初礼器的产生主要就是配合原始宗教祭祀仪式的需求。新石器时代的玉器主要是作为服务于为宗教目的而举行的巫术祭祀仪式的礼器，所以玉器成为当时社会统治阶层权力和身份的标志，受到高度重视，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其形式和功能也都是受制和服从于当时的原始宗教观念。

【1】叶茂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地区出土玉器概述》，《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5）》，科学出版社，北京，2005年，前言。

【2】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北京，2002年。

### 三、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分区

虽然从宋代金石学开始，就已经把玉器纳入了研究范畴，但是，明清、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玉器的研究方法仍是以文献资料考证为主，或结合博物馆、私人收藏的传世品。考古发掘的玉器因为数量较少而并未受到发掘者的重视，在发表的考古报告中对玉器一般不做详细的描述和介绍，大大影响了对古代玉器的学术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通过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各时期的玉器数量大增，很多文博、考古学界的学者将玉器作为研究对象，在玉器研究的方法上也向考古学靠拢，其中最多的是借鉴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正如夏鼐先生所说的：“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我以为现在我们应改而采用考古学的方法，充分利用现已由考古发掘所积累的大量资料。”<sup>【1】</sup>

距今5000年前后是新石器时代玉器最为发展的阶段。“距今5000年前，正是我国上古史中一个社会激烈变动和文化频繁交汇的转折时期。”<sup>【2】</sup>属于“玉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地区，有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峁遗址、大汶口—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峡文化、石家河文化、凌家滩文化和台湾的圆山文化、卑南文化等<sup>【3】</sup>。根据考古学界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分区，结合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质色、器型、纹饰、制作工艺等方面的特征，可将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划分为东北地区、海岱地区（黄河下游地区）、黄河中游地区、黄河上游地区、长江中上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华南地区等。

在中国古代玉器通史中，大体以秦岭—淮河为界，将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分为两卷来讨论，本卷为北方卷，以秦岭—淮河以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玉器为讨论对象。在写作方法上，我们大体上以地区来划分“章”，每一章中基本上是根据时间的发展来划分“节”，但并非面面俱到，而是就重避轻，对于其中出土玉器较多的地点、具有特色的玉器和热点问题予以重点关注。

【1】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

【2】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3】牟永抗、吴汝祚：《试论玉器时代——中国文明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考古学文化论集·4》，文物出版社，北京，1997年，第164~187页。

#### 四、秦岭—淮河以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发现与研究

秦岭—淮河以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玉器以东北地区最为突出，兴隆洼文化玉器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玉器之一，将我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历史推进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创了我国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红山文化玉器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最高水平的代表之一，确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玉文化发展的中心区及玉器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学术界对东北地区玉器的研究是整个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中最为集中的。

对红山文化玉器的确认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此之前，人们一直把它们当做商周时期的遗物。随着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玉龙的发现及1973年阜新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掘，红山文化玉器才开始受到考古学界的重视，此后由于喀左东山嘴和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科学发掘，红山文化玉器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大讨论，以苏秉琦为首的考古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已经达到了形成国家的程度，是“中华文明的曙光”，从而将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前了1000年，而红山文化玉礼器也成为文明的标志之一，突破了此前以文字、城市和金属器作为文明“三要素”的观点。

大致来看，对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是逐步深入的。80年代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对玉器特征的描述和时代特征的考证，而到了90年代，则在玉器的器型分类、玉材质地、制作工艺、使用功能等方面的综合研究以及对某些重要器类（如勾云形器、筒形器、玉猪龙、三孔器等）、玉材、工艺等个案研究方面有了很大进展。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以来，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进展可圈可点：一是对红山文化玉器属性的探讨，确认红山文化玉器及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主要功能是巫师的法器，为玉器在器型、纹饰和功能方面的解读开辟了一个有利的切入点；二是对红山文化玉器时空分布及源流问题的探讨<sup>[1]</sup>。

进入21世纪以来，红山文化玉器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研究方法上的

【1】周晓晶：《从牛河梁遗址M21出土玉器看红山文化玉器的北方因素》，刘国祥、陈启贤主编《玉文化论丛4（红山玉文化专号）》，众志美术出版社，台北，2011年，第48~60页。



改变，尤其是2001年5月在沈阳召开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sup>[1]</sup>、2004年5月在大连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中国玉文化、玉学学术研讨会”<sup>[2]</sup>和2004年7月在赤峰召开的“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sup>[3]</sup>，都是以红山文化玉器作为中心议题，使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有了重大进展，将原始宗教信仰与史前玉器的研究结合起来，并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玉神学”<sup>[4]</sup>。杨伯达在《巫玉之光——中国史前玉文化论考》一书中，提出了以“巫书”释巫玉来解读新石器时代玉器的研究方法<sup>[5]</sup>；郭大顺提议建立“红山学”，以考古为中心，涉及历史、宗教、哲学、建筑、雕塑、玉学等多学科内容，对红山文化及其玉器进行全方位的研究<sup>[6]</sup>，将学者们对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视线引向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方向。

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虽然出土玉器的数量不是很多，但风格多样，能够反映该地区与北方红山文化、南方良渚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关系。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并进行过专题研究<sup>[7]</sup>。

【1】费孝通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燕山出版社，北京，2002年。

【2】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5年。

【3】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北京，2006年。

【4】杨伯达先生在《关于玉学的理论框架及其观点的探讨》一文中，将“玉神学”作为玉学理论的基本框架之一。见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2年，第165~185页。

【5】杨伯达：《巫玉之光——中国史前玉文化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5年，前言。

【6】勿日汗、李惠子：《考古专家提议建立“红山学”》，《中国文物报》2006年8月16日，第2版。

【7】邵望平：《海岱系古玉略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北京，1995年。邵望平、高广仁：《海岱系玉文化的流变》，钱宪和客座主编：《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台北，2001年。雍颖：《海岱地区出土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故宫学术季刊》17卷4期，2000年夏季，第1~52页。